

卷一 殷周秦漢三國

三代書跡略述

古人以夏衡嶽岫螭碑爲書跡鼻祖。吾嘗於會稽禹廟觀其翻刻之石，觀其形體，不能古於殷商西周也。柯謐齋昌泗語石異同評卷一有云“夏岫螭碑，舊著錄皆以褒然稱首。金石萃編最會衆說，疑似傳疑，近人久置之不論。觀其文字，雖轉摹失真，實有所本。周末金文，有爲鳥蟲書所從出者，即與此相近。奇觚室吉金文述所錄熊氏、陸氏兩鐘，尤爲形似，此類宋人名之蛟篆，與此碑并定爲夏時物，蓋亦知其時地相同也。唐李綽尚書故實，尚書省有古鐘，紫金文鳥篆，記禹功者，與宋人說合。或此碑祖石，時已流傳，是以相承說爲夏器耳。今以諸器款識考之，多屬南方楚越等國，近年壽州大出楚器，鳥蟲書尤多，以時地互證，此碑即楚時之刻石也”。柯氏謂岫螭碑爲東周楚地刻石，實爲通恕之說。究其源委，最古亦不過在西周東周之間，古人傳爲夏器，非是也。今世考古極興，掘墓穿地，深鑿泉壤，皆正名以學術，專崇智數，其所知固大勝於前。蓋古人猶懷敬畏，焉能以開穴爲事業，德墜而智生，亦可嘆也。禪家云思盡還源。究其本然，無智亦無得也。

最古之文字，世推大汶口之陶紋。然亦在萌蘗耳，何足以論字學。夏時之物亦罕觀。尤古者殷周之吉金銘文及殷墟卜辭也。吉

金甚少而甲骨極夥。其時字學差備，象形、會意、形聲、假借諸法俱用，可於卜辭觀之。書學亦隨之而興。殷商吉金渾古高華，環絕樸茂，後世西周鼎文對之，往往失色。而卜辭簡約瘦瘠，神清而形薄，自不能如吉金之渾茫。如母戊方鼎銘文等，即其時之傑作。周本蕞爾小邦，爲殷屬國。彼時殷之文明，冠於天下，風化四裔也。

蘇子由古史有云“嘗試求之詩書，詩之寬緩而和柔，書之委曲而繁重者，皆周也。而商人之詩，駿發而嚴厲，其書簡潔而明肅，以爲商人之風俗，蓋在乎此矣”。使以形容二代書法之異，亦相合也。吾觀夫殷之書，一團渾樸元氣中，確有駿發嚴厲、簡潔明肅之意者。而周之書，於渾然間，確亦漸趨於寬緩和柔、委曲繁重之體。蘇子謂風俗在此，實亦可援吉金書跡爲其徵驗之一種也。

周之文教承殷而自具變化，如商重卜占，而周研易數，愈爲精密，文字亦然。武王滅商立周之後，文字尚存勝朝矩矱。其字體固有別於殷，而氣息甚近，皆環奇渾茫。此與武王受箕子鴻範九疇同。（周之字體亦有異於殷契，今人又別爲商系、周系者。）西周中期，書體趨於端平莊凝，禮樂氣象，自是周代鬱鬱乎文哉，自然呈露。恭王時之牆盤器銘，威儀溫栗中，饒有蘊藉，最能怡情。西周季世，厲王以降，迄於春秋，書體漸變，由莊縝入疏奇，由文質彬彬入於跳踉怪放。此亦與禮崩樂壞之世運相當。如幽王時之周嬪敦器銘，宣王時之虢季子白盤，厲王時之散氏盤，皆能觀此變異。此風入東周愈熾。各國文字，亦往往作割據之勢，自闢蹊徑。

秦在西周故地，文字宗周矩矱，尤以石鼓聞名。後又變爲小篆，爲斯篆之導源。石鼓、斯篆，皆與西周中期之吉金理脉貫通。此秦氣象弘正處。其之能滅六國，興一統，非僅恃於霸力權謀者，亦可於此窺之。魯齊東方諸國，自導源於周公、尚父，然地域瀕海，文字亦異。魯國文字，即漢世之所謂孔壁中古文，如許叔重說文解字中所錄之古文，漢季三體石經之古文，大體皆魯地春秋時之字體也。秦魯雖異，大體端正，承禮樂氣象，惟秦尚渾圓多古致，魯多廉稜有新意耳。秦魯之間中原諸國文字，亦游離二國之間。如出於

河北平山縣之中山壺器銘，爲戰國時物，字體有近於秦篆，而書風有近於魯之古文。惟楚國最奇譎，其書體往往有楚地尚巫之風，不可方物。近世出土戰國之器尤多，如曾侯乙編鐘銘，脩長奇異，其他誕放之體殊衆。楚簡出土亦多，觀之尤可知楚地風俗之異。然其簡牘書法，獨有絕詣，亦非中原所能有。彼時諸子百家，各逞學術，或玄微深閎，或以繩墨自矯，或中正寬博，或以峻刻爲法，史所未有。其時書法，必有受此激蕩熔鑄者。觀楚簡，尤可想見其時楚國之精魄風氣，想見屈子執筆作楚騷時神采。秦滅戰國諸雄，書同文，車同軌，然各國遺風猶在，迄於西漢猶未絕。故論西漢之書者，又不得不索諸戰國。三代書跡大致如是，其幽微處蓋非後世人所得盡窺。而殷商數百年書跡，曷嘗無變化，惟器物未多，無從考辨耳。（近人亦有強自立說者，愚未敢信也。）

殷契營魄抱一不修而得

孫仲容古籀餘論後序自謂恒耽玩篆藝，案校奇字，每覃思竟日，輒萬慮俱忘，眇思獨契，如對古人。愚年來閉鍵撰書史，頗多之感。此心志凝定之境耳，尚不足以窺大樸太素。觀殷周之迹，非晉唐可比，使不能刊落紛華，收攝精元，忘來時路，則其於殷周之迹，必不能神契也。而殷商之書，又淳古於姬周，猶黃帝之師，尚有赤松子諸仙人。老子曰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此真殷墟甲骨及殷器金文之形容也。觀彼時吉金銘文，往往有載營魄抱一無離之感。鑄文於甲骨，亦每覺如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道德經曰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朴。觀殷契之清簡素朴，實可想見其時淑氣，乃爲老聃所追慕者。蓋悶悶之中，其意醇醇，是以其書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害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曜。周武革命，吉金之文漸成新式，乃已遜其悶悶醇醇之意，如散氏盤、宗周鐘，光而有曜，周公簋，廉而有節，降至東周，秦地之書，如石鼓以下，直而愈肆，楚地之書，

如王子午鼎器銘，方而愈割，詰屈奇詭，以就繁縟，殷周之際渾沌之神，至此則大散矣。豈僅禮崩樂壞而已。雖然，西周吉金，不失大雅。小戴禮禮運所謂大積焉而不苑，細行而不失，深而通，茂而有間，連而不相及，動而不相害，此順之至者，適以爲西周金文之形容。世之讀老莊者，使其盤桓殷契吉金之間，當能愈會其神意。殷周古文，詎惟有裨於考據而已哉。禪門每云無佛可作，無道可修。佛性本具，不須修行。殷周金文，其於書道，乃真不修而得者。彼時乃無有所謂書道者存焉。故特與此禪義相符契也。（宋末韓性書則序云“蓋書者聚一以成形，形質既具，性情見焉。異者其體，同者其理也，能盡其理，可以爲則矣。三代之時，書以記事，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。然而鼎彝銘志之文，俯仰向背，精入芒髮，是豈有意於工哉。亦盡其理，不能不工也”。韓明善所謂盡其理，即愚所言之管窺一，無爲而無不爲者。惟盡其理云云，爲有宋道學語，不足以形容三代之渾然也。）

書道亦有會意假借二義

性理崇程朱，樸學尊許鄭，皆情摯而互有詆訐，曷嘗非五十步笑百步之例。乾嘉諸儒治小學，膜拜許叔重說文解字，迄於章太炎，猶如是也。章氏至斥甲骨爲贗，而固守說文之故轍。此與末世迂儒口必稱程朱不識大義何以異。子曰，毋必，毋意，毋固，毋我。吾固知性理、樸學之流風，皆有悖乎聖人之教存焉，樂其教者不可不慎也。蓋自殷墟甲骨之學大興，許氏說文之繆愈顯。甲骨形體，爲文字源委，審其源委，自可判其字爲六法之何種。如說文云監，臨下了，從臥，𠂔省聲。然甲骨監字，爲象人臨盛水之皿俯視之形。上世以水爲鑒，純爲會意字。許氏言其從臥，𠂔省聲，爲形聲法，繆矣。如此類甚夥。故甲骨功於小學考據極巨，爲今世之顯學。究其發明六法獨深切處，莫若會意、假借。會意者，因形體而知其意旨，假借者，以音同而假借異字，前者由形而求意，後者因音而得其義。此實爲字學兩大宗，較象形之樸古，形聲之後起愈

重矣。

竊謂書道亦有會意、假借二義，前人罕有道及者。（假借之義尤有可味。近覽清儒劉逢祿春秋論下有云“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，改周制而俟後聖，猶六書之假借，說詩之斷章取義”。則予之以假借說書道，亦自然爾。無可怪也。）此二義爲遠祖筆文之際心識之遺變，字學既備，而轉潛化於書法。觀其表徵，似無關係，究其心識，實有相連。會意者，會物我天人之意也。文字以物我會意，書道以天人會意也。書道特重神意，意在筆先，爲根本命髓所在。晉人尚神韻，莫非其意趣所之，後世奉爲極則。晉人尚天人之氣韻，盛唐漸轉尚天地之氣象，故唐之意已異於晉。宋人山水畫陵邁隋唐而變，故宋之意又異於唐，其書法亦大異矣。究其源委，心識之異，即意之異也。

假借者，假借簡化異形以表字，非同於六法假借之多假異字以表音也。然形雖簡化，幾同肇創，而音不變，亦合乎假借爲同聲依托之理。（草體亦如同異字矣。）書體由籀篆入隸，假借也，由隸入草，草體之漸熟於東晉，尤爲假借也。其狂草之體，興於盛唐，則純亦爲會意，已不復能以假借籠罩矣。張顛睹公主擔夫爭道，得悟筆法，豈非爲會意耶。此與上古觀物理而肇會意之字，其用有殊，而其神理則若一。假借之義，關係書史甚巨。草體簡化，大異於本字，不可以其他五法繩之，惟可推之假借耳。且人創假名，其形根於漢字，亦假借，而以表音，亦同於上古之用。書家作簡易之體，以假借而合於會意，鍾王一脉，遂爲書道之正統。今日書道之變，亦於此二端求其極致耳。故書道亦有會意、假借二義，知此則可語於書法大體之變通矣。或譏余說有傳會之嫌，余初亦不自信，深思之後，則無疑矣。其確有中理者。吾國字學書法，豈真有貳哉。

籀文非書體名

世以周宣王太史史籀爲籀文之祖，作史籀十五篇。近儒疑之。羅雪堂殷商貞卜文字考云“史籀一篇，亦猶倉頡、爰歷、凡將、急就

等篇，取當世用字，編纂章句，以便誦習”。昔人作字書者，其首句蓋云太史籀書，以目下文，後人因取首句“史籀”二字名其篇，而非爲史籀所作。王靜安觀堂集林史籀篇疏證序辨析愈精，乃疑“史籀”非人名，史籀一書，春秋戰國之間，秦人作之以教學童，而不行於東方諸國，其爲周秦間西土之文字，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殊異。其說甚是。齊魯間文字作法之異於周秦，近世出土古器銘文多有證實之。清儒鄭子尹作汗簡箋正，謂“郭忠恕汗簡所錄古文，或不合於籀篆，或不合於說文六書，多好奇之輩影附詭托，務爲僻怪，郭氏亦往往自我作古，變易形體以就已律，不必其出處有然”。然近世戰國古器出土甚多，其銘文形體往往與汗簡同。子尹之論繆矣。蓋前人素以籀文爲書體，以籀篆爲東周文字之準繩，汗簡不合其形體，即目其爲贗僞，失之多矣。清儒之疑古，多有是病。

觀堂集林又有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，有云“故古文籀文者，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，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。而秦居宗周故地，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，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，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爲近。自秦滅六國，同一文字，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，已焚燒划滅。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，又其文字爲當日所已廢，故謂之古文。此語承用既久，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，而籀篆皆在其後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，蓋循名而失實矣”。真可謂發二千年之覆也。以今世之所獲之資料言之，殷有古文，可以殷墟甲骨爲典刑。其後有西周古文，中葉愈醇密，可以散氏盤銘爲準則，乃大篆之體。東周而後，秦地有籀書，由籀而作篆，東方齊魯，南方之楚，承西周古文，皆各有變化，後世漢人號孔壁書爲古文，然并不早於籀篆，非殷周之古文也。故今人論書，東周分秦、楚、齊魯、三晉諸系，覲縷愈細矣。（可參今人叢文俊春秋戰國金文書法綜論。）猶論學者，如蒙文通氏之經學抉原，喜分魯、齊、晉、楚諸學，而析其奧秘，常有豁然祛滯之感。

惟籀書之名，由來已久。張懷瓘書斷言籀文與古文、大篆小異，後人以名稱書，謂之籀文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。李斯小篆兼采

其意。則懷瓘以籀文爲書體，且以籀、篆爲大篆之子孫。王靜安史籀篇疏證序業已駁之，有云“史篇文字，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，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，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，稍涉繁複。象形、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。推其體勢，實上承石鼓文，下啓秦刻石，與篆文極近”。其後又云“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。一、籀文非書體之名，世莫不以古、籀、篆爲三體，謂籀文變古文，篆文又變籀文。不知自其變者觀之，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，故一卷之書而前後異文，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，凡既有文字之國，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。許君謂史籀、大篆與古文或異，則固有不異者。且所謂異者，亦由後人觀之，在作書時亦只用當世通行之字，有所取捨，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”。所論極有理致，發人深省。懷瓘謂石鼓文爲籀書，實則宜稱之爲大篆之秦化也。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之說，尤能警策。書斷之言史籀之造大篆、籀書，李斯之作秦篆，仙人王次仲之作八分，程邈之造隸書，皆未足徵信，懷瓘且已有疑之矣。竊謂自其變者、不變者觀之云云，乃學子瞻前赤壁賦。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文字殆無往而不變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是所謂固有不異者。靜安之論籀篆，特爲弘達，非治書者所能爲。論者不可不知之矣。（作此篇畢，得覽今人叢文俊氏籀文考一篇，亦嘗引王靜安之說，維持舊說，以史籀爲西周宣王時史官，嘗作籀文。蓋亦斟酌之說。羅王二氏史籀乃爰歷、急就之流之說，固爲理推，未爲實物證明。然其理甚能服人。如章草者，以急就篇而盛行於世，所謂籀文者，亦能以史籀篇而通行之也。靜安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之說，確爲不易。使史籀真有其人，籀書亦非其所能創。矧籀書本無定形，不宜視爲書體也。使籀書爲周宣王時所創，其去散氏盤應未遠，然視其形，愈近乎秦篆，不類西周古文。觀堂集林說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一篇，頗可證秦篆出於籀書。籀書東周秦地之字，大篆之流變，宜爲李斯輩所取。觀陳直氏讀金日札所附秦商鞅量銘、秦右庶長歇封邑陶券，有極類斯篆者，亦有如石鼓文者，蓋即籀書之流。故靜安之說，吾是之也。）

石 鼓 文

夫愛屋及烏，誠樂事也。予尤於王蘧常氏 秦史有感焉。瑗仲先生近世書學一大師，撰秦史特設文藝考述石鼓文，要不失本色。其有云“此刻爲修治道塗，行役漁獵而作。論者皆以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，至宋鄭樵據其文中毌、缶等字，始定爲秦篆，以爲惠文王後、始皇前。其後說者紛紜日益，莫衷一是，或漢，或晉，或北魏，或西魏，至近代始確定其爲秦刻。惟時代尚不一致，或以爲文公，或以爲穆公，或以爲襄公，或以爲靈公。惟唐蘭由銘刻、文學、語彙、字體、書法、地點、篇次、地望八方面分析之，定爲獻公十一年作。宜若可以爲定論矣”。又小注云“此刻後於秦公簋一百六、七十年，早于詛楚文六十四年，繹山碑一百五十五年”。雖未必然，亦可資稽驗。（瑗仲之說，又多本於馬衡之石鼓爲秦刻石考一文。觀馬氏之文，亦知其採羅、王之說，不以籀文爲書體也。）春秋戰國文字衍化之跡，莫顯於秦。其處西陲，素爲鄒魯齊晉所輕，而不料後世亦惟秦之文跡最可恃，爲書學演化之大佐證。斯文實有繫於秦也。此猶尚書之以秦誓爲殿，以穆公爲配列聖賢之最近世之人，識者亦可覘其命勢矣。編書者不取同時他國賢哲之文，而獨取秦穆，豈非亦以其文字達奧直截，有合古聖典謨之處耶。故知秦處西周之故墟，非惟書體承周文之正脈，文辭且守先聖之誠然，樸茂直達，亦有爲齊魯文勝之邦所弗能及者。故曰，斯文有繫於秦也。東方諸國禮樂之邦，素輕西秦，實亦挾有我慢偏見也。

郭店楚簡之密意

楞嚴經卷五憍陳那五比丘自述我於音聲得阿羅漢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音聲爲上。優波尼沙陀自述從色相得阿羅漢果。妙音妙色密圓，而頗與密乘同理。密教依身語意三密修行，持密圓神

咒，立秘密曼荼羅，神咒近乎音聲之道，曼荼羅近乎妙色之相。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云“謂每一一字，即體是諸佛菩薩身心故。真言中字，法爾諸佛不思議力加持故，法性如是故，徧有神用。如此方言語足一，唯急急如律令等語，咒火不燒，咒水不溺”。妙音妙色，誠天地之奧窔所在。依佛意，一切悉有密意，音色之道，轉而能通佛意。先聖禮樂之道，禮近乎妙色，樂近乎音聲，音者生於人心，樂者通乎倫理，樂者爲同，禮者爲異，同者相親，異者相敬，樂者天地之和，禮者天地之序，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樂興，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，樂乃情之不可變者，禮乃理之不可易者，禮樂之說，管乎人情矣。則禮樂之道，亦皆有密法，而管乎身語意三密瑜伽也。吾習佛時，嘗於一日中，忽聞孺童呼其父，其音絕有密意。春游靈峰寺忽聽園池蟾蜍之鳴，其音亦絕有密意。書齋中忽覽郭店楚墓竹簡五行篇，其相亦絕有密意也。頗能悟佛義聖學之蘊蓄。蓋孺童、蟾蜍之聲，發之天然，而楚簡乃真若有諸聖先賢神力加持者，即體是諸聖先賢身心，觀之悚然，感其力也。

郭店楚簡五行篇，儒家之學。此墓有儒家十四篇，道家二篇，皆戰國時物。其書圓密靈轉，筆意遒逸，無西周中原金石之渾嚴莊肅，而有楚地之飄游如神，往往得鸞飛魚躍之姿，活然觸目。春秋戰國各國之書，尤以楚書最具玄奧之意，如王子午鼎器銘、王孫遺者鐘銘，幾爲道教符籙之先導矣。道教本發源於南方，蜀楚之地，爲其胎息所在。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，籙者素書記諸天曹官屬吏佐之名，其皆道教秘文，而來源隱昧。溯道教之先聲，巫術、圖讖、黃老、神仙之說也，而多於楚地最盛，其承取楚篆之形，用諸符籙，蓋亦自然。彼時修道者，自亦能感其文形之密意，有通乎天人者。巫、符雖無足語與大乘之高明，其理固有相近者也。（近世大儒錢賓四先生，晚年撰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，其略論中國科學一篇，至引辰州符，念咒焚符，使死者隨其步行。其有云“此事極神秘，但非人文要道，中國人乃亦置不深究。但論其始，必有人先通此術，乃以傳人。其如何得通此術，倘詳述經過，亦一絕大科學問題，不得謂之乃神怪”。錢先生信辰州符，儒者

所鮮有，自其晚年通達處。吾於鄉間亦睹聞巫法靈驗神通事甚多。符籙之學，不可徒以神怪蔑之也。象山先生語錄有云“子不語怪力亂神。只是不語，非謂無也。若力與亂分明是有，神怪豈獨無之”。愚意同然。可參錢氏默存管錐編一五七則，辨析甚精。大隈重信編撰之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神道一篇有云“智學與德教，固異其徑路。宗教者爲德行之源泉。如運命之豫知，實出於不欺明暗之一念，雖智者亦宜深敬重之。今世科學大發暢，闡啓神秘甚多。然至於廣大神德，則不過管窺之天，蠡測之海，而均爲人類之淺智，與愚夫愚婦相距僅尺寸而已。自恃尺寸之長，而嘲人以迷信，特不知其自迷於神變不測之情。苟自反省，則必自覺其評曰迷信者爲反迷信之言”。此久米邦武氏寫於約百年前者。今日視之，亦不可易也。）是以古人恒言倉頡造字，鬼神哭，天雨粟，而甚信之而祠焉。蓋古文之密意，關乎天人鬼神之間，其於楚國竹簡，猶能窺其神秘。其後世道更替，隸體盛行，人於此意，所知愈少，是故往往非笑古說，以爲神話爲誕妄爾。吾觀楚簡，猶欲哭也。玄古之際，神魂血氣，豈非特壯於今。頤仰觀奎星圓曲之勢，俯察龜文鳥迹之象，博采衆美，合而爲字，是曰古文。文字之肇，豈非揭天人之奧藏，一如佛之說法，豈祇振動寰宇而已。此吾觀郭店楚簡甚有悟者。日本池上本門寺藏鎌倉時代高僧日蓮真筆十界大曼荼羅本尊，亦極類符籙，惟其所書法華經諸佛名耳。且梵藏經藏字母，往往形亦如古篆。孰謂其全無相近處。佛密、符籙、楚簡，其之有相通，無待言矣。

秦斯篆評

清王澐虛舟題跋篆書謙卦家人卦有云“伊川云作字須用敬。篆律尤嚴，毫髮有忽，全體俱廢，知此義者可以語學矣。一準小篆，變化自生，至於參差俯仰，一中矩度，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。圓潤和明，仁也。中規合矩，禮也。布分整飭，義也。變動不居，知也。準律有恒，信也。五德具備，舉而措之，無施不當矣。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。由此而悟書法，行楷草章，直如馳驟康莊耳”。所述小篆五德，殊爲精闢。李斯爲法家，然曷嘗不具此體要。蓋古

人精氣，往往敬嚴自律，內養甚充，外施諸用，惟內養外施之道各異耳。其理則一。讀墨子，其說異於儒，然曷嘗無類此仁禮義知信之理。故虛舟之論，不專爲儒家發也。唐張懷瓘書斷以易離之六二黃離元吉，得中道也，贊斯篆之造極。蓋以儒經之中道，許李斯之書法。李斯倡焚書坑儒之策，爲後世儒者所斥。然平情觀之，其輔弼秦主所成之政體，開二千餘年儒統，所拓之疆域，定華夏恒久之格局，所立同文同軌之制，爲後王所襲傳，函夏文教學術之昌懋不泯，莫非書同文之制所遺者。故斯篆亦得黃離之中道，於書法中，亦可窺秦朝氣象，有類於中道者。世人徒以霸術目之，非入髓之見也。

懷瓘論書，確有真知。書斷贊斯篆曰“李君創法，神慮精微。鐵爲肢體，虬爲駢駢。江海森漫，山岳巍巍，長風萬里，鸞鳳于飛”。其書精猛遒健處，懷瓘發明之。此虛舟題跋所未備者。圓潤和明四字，尚不足以盡其微旨。唐李少溫，於精遒處有邃造焉，所以有大成。清儒作篆者甚夥，而多爲圓潤和明所囿，所以不能入古人室奧。鄧頑伯、趙搢叔不欲爲圓潤和明所囿，而失之率野也。惟書斷謂小篆由李斯草創，則謬矣。蓋戰國時西秦已有此體，觀其時之銘刻，可以知之。李斯天才，挾天地壯觀，入於毫端，所書嶧、泰、琅琊、之罘、會稽諸刻，名垂宇宙，非他人能辦。（惟嶧山碑後世所見者多爲徐鉉所摩之本，其與原本之氣息用筆，相距不淺，誤導後人亦愈多矣。）諸刻之文，錄於嚴可均輯全秦文中。觀其辭氣，亦可與其書之得中道者相融通，俱可明秦朝氣象之弘大，豈六國可與比。蓋無此氣象，中華不復爲中華。後儒純以霸術蔑秦，自有大義在焉，關係風教，然終未爲圓滿。使李斯無諸石傳世，亦無以想見其人神采矣。書道之有裨於史論，此亦一端也。（論秦代書法者有一造筆之問題。世傳蒙恬造筆，然非謂毛筆自蒙恬始有也。古人早已及之。晉崔豹古今注云“生亨問曰，自古有書契以來，便應有筆，世稱蒙恬造筆，何也”。答曰“蒙恬始造即秦筆耳，以枯木爲管，鹿毛爲柱，羊毫爲被，所謂蒼毫，非兔毫竹管也”。可供學人參稽也。）

隸書之興

夫李斯之篆，得廟堂之氣爲多。雲夢秦簡，風俗之氣兼勝。雲夢秦簡，乃秦昭襄王五一年之物，先嬴政一統三十餘年。其簡所涉文籍，有爲吏之道、秦律十八種、秦律雜抄、法律答問、編年記、文書等，皆爲政書，殊能見秦地方政治之大體。其書體尤可玩味。楚地戰國竹簡之奇譎，至此已歇，雲夢秦簡以小篆行文，大體端明，然猶藏楚簡奧意，觀之乃有與包山、望山楚簡一脈相承者。楚地之風俗，不能脫盡也。秦簡尤奇者，乃篆筆中隸法已見，有與漢簡極相類者。觀此而知，隸書之萌蘖，其最晚亦在戰國，而非秦一統後。

古人已識此矣。唐封演封氏聞見錄卷二云“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，前和外隱起爲隸字，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，惟三字是古，餘同今書，故知隸書非始於秦氏也，按此書隸在春秋之前，但諸國或用或不用，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，故修改而獻，非創造也”。據此則不僅楚地秦簡有此隸字，齊國亦有此隸字也。唐季五代丘光庭兼明書隸書所始一條有云“隸書之興，興於周代。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，曰亥有二首六身，是其物也。土文伯曰，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。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狀。按古文亥作𠂇，全無其狀，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，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，則是今之亥字。下其首之二畫豎置其傍，亥作豕，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。據此亥文，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”。後又引水經注中臨淄古冢之證。言隸書興於周代，當時未全行，猶與古文相參，自秦程邈已來，乃廢古文，全行隸體。故程邈等擅其名，非創造也。

竊謂以雲夢秦簡而論，竹簡狹長，便於書寫故，篆體漸成隸法，其一也。秦篆與楚簡融合，自成一格。隸意者，實亦戰國諸國文化之遺意所在。秦篆與諸國風俗相融，其國遺意猶在，乃使篆體亦變，如雲夢，有近乎後世之所謂隸者。其二也。大凡隸書之肇，不脫此二端。篆體尚長，而隸書尚平，諸國之書，如楚簡尚平橢寬博，

吾是以有斯議。故知隸書之大行，亦天下融和之大勢所蘊造，非徒爲省略便利之事而已。觀羅雪堂所刊秦金石刻辭，如甲兵虎符、廿六年詔小權等，尚能見秦篆之大體，然已略露瘠儉之相，其神采已不及楚簡，韻度大衰，其距西周吉金，不能以道里計。（見新文豐叢書集成三編。）故知秦書求高華如斯篆、雲夢簡者，亦不可多。此衰直至西漢，漢武、王莽之間，始漸茂豐。及至後漢，方一時極盛矣。至此篆體脫落幾盡，隸書淬鍛已成，獨成其體系，開始其新生矣。前謂隸有戰國之遺意，秦篆時已有隸體。而至後漢，篆體已散，而其遺意亦永存於隸書中矣。

兩漢書法

前漢書法，戰國季世、秦朝之遺響爾。馬王堆帛書，楚簡、秦簡之餘脉也。刻畫金文，周秦器銘之餘脉也。蓋周代數百載之積蘊，而有散氏盤。秦自莊公以迄嬴政亦數百載，而有嶧山諸碑。其氣象之弘雅渾整，由來已久。西漢立朝，一時君臣，多出於草澤，非諸侯世家之後。若論識見學問、氣息涵養，俱非高華，故其初年格局未弘，惟慘淡經營，休養生息，美之曰黃老治道而已。其氣象至武、宣始爲一振。故觀前漢金文，殊少廟堂氣，有局促狹隘之態，較之周秦重器，不啻爲家鷄野鷺耳。武、宣以降，氣度稍寬博。新莽篡漢，事事摹古，觀新莽量金文，氣脉恢張，絕有神采，已啓後漢袁敞諸篆碑及三國天發神讖諸石。故論漢代之書法，高祖以迄武、宣，不過爲東周秦朝之遺緒。其甚有變化者，如隸法漸盛，筆含篆隸之風浸多而已。今所存西漢武帝之後簡帛書甚多，在篆隸之間，乃知後世之所謂隸草，猶爲隸體純熟之前身。漢簡之草體，毋寧名之曰篆草也。西漢中世以迄新莽，格局方弘，氣象始裕，初年寒儉之習略盡。觀前漢宣帝五鳳二年魯孝王刻石，氣魄雄直，雖已開隸碑之規模，猶存渾沌之氣，可知其時之隸體，方在胎娠中。前漢成帝河平三年庶孝禹刻石，隸體較五鳳愈淳，而猶帶篆筆。新天鳳三年葉

子侯刻石，形雖率野，字體則愈爲方整，篆書圓轉之勢脫落矣。（然此碑有僞作之論。姑存疑焉。）後漢立朝之後，嗣此脉絡。觀建武十二年李業闕題字已與晚世碑刻有極相似者，渾樸微過之耳。建武二十八年三老諱字忌日記愈爲淳靜，乃真爲漢末諸碑之祖。至中葉晚期，書學極盛，漢碑大出，風氣雅正適逸，隸草之體亦極盛，超宕靈運，迥異於前漢之簡，函夏書道，至此騰越爲顯學。此與漢之儒學，振自武帝，爛熟於東漢之季，漢人之風節清議，振自汲黯、兒寬諸賢，而極茂於漢季黨錮時士風同也。此積蘊之所至，非人力所可強致者。

東漢中葉，實爲吾國書史之鑿破渾沌之期，實爲一大分水嶺。蓋此前尚在渾沌質樸之氣中，一切書寫，悉本自然，人少自察焉。至此則今世之所謂書法之自覺意識者滋生漸茂，智慧開矣。（此分水嶺在开通褒斜道刻石之後，石門頌、乙瑛碑之前，即在漢明帝之永平、桓帝之永興之間也。）其於道術固不能無損，然於藝術則燦爛空前。藝術乃道術之次者，高者由藝反道，境界渾厚，卑者游藝迷道，愈趨浮薄。世間從來卑多高鮮，是以藝術之道，甚須慎重也。西漢書法，隸書漸興。然其初葉，篆隸之法，往往糅合用之，殊多奇姿。近世篆印嘗有取之，獨有光曜。隸法純然，還在新莽之後，至後漢中葉始極備。故西漢書跡，未可與後漢比。推其極詣，帛書如馬王堆，簡書如神鳥傳、敦煌居延諸漢簡，金文如新莽量，極有高華之氣。其他所見甚寡，不能強求之。雖然，西漢終在渾朴中。東漢精密，終已入有爲之時代矣。

漢武威儀禮簡

當漢經術極昌時，簡帛往往有六經，猶佛法隆興時之寫經。其書之氣體每與其教義趣相契，書跡應心識而化，如影隨形，合當如是。漢武威儀禮簡，即其典範。漢碑石刻之體，除禮器、曹全、華山諸神品外，或嚴重有餘，溫潤不足，或閎廓有之，失之質野，祇能見

漢人之一體，而無以洞悉其真相。碑刻中下之品，往往恂慄，近於瑟兮僊兮之意，其得禮意爲多，得樂意爲少。故論漢代之書，不可不兼取漢簡。蓋簡牘帛書，每以溫潤寬裕勝，含素抱朴中，有從容不迫之境，不似碑刻入石之際，其真氣難免爲鐫者所損，雖毫釐之間，亦已異矣。觀儀禮簡，氣息醇和，形體密栗而舒，令人想見孔子閒居申申夭夭之意。如此者，愈與禮樂之道相契。三禮之學，吾素親小戴禮、周禮，而疏儀禮，以其繁縟曲密，不若所親者鴻文邃義，大有美觀。自觀武威儀禮簡，忽悟曩日之偏。儀禮之經，誠有寬和疏朗若此簡者，疇昔畏其繁縟，實有不察焉。加以時日，吾亦當親乎儀禮矣。漢簡之錫予者，莫若此也。

東漢三國碑評 三十四種

三老諱字忌日刻石。此刻封於孤山西冷印社石室中，予月必一過，惟畧窺其石影耳。使以東漢季世之隸體視此碑，猶以斯篆之視散氏盤。三老古樸天真，若未開化，實則神氣蕭散，渾無安排。新莽、建武之際人物氣象，自大別於蔡伯喈、鍾元常輩時人也。二百年間所以有別異者，一者無安排之念，一者有安排之念耳。鍾王之爲書聖，乃有安排之世界之書聖也。惟無安排之世界，無須書之聖人也。近覽日人柳宗悅所著之書，則予無安排世界之說，頗可與其論工藝之道者有相契者也。（右三老碑。立於建武年間或稍後，不早於建武二十八年。）

开通褒斜道刻石東漢巨製，隱於岩薜，千年後而遇南鄭令晏褒，刻釋文，復爲苔侵，又數百年後再遇畢沅，始大露於世，蓋亦奇矣。自古知音難遇多類此。此刻體碩字寬，古方闊大，如見西漢人，篆隸渾合，有神龍莫可測之狀。楊守敬平碑記言其長短廣狹，參差不齊，天然古秀若石紋然，百代而下，無從摹擬，此之謂神品。竊謂神品則過，而不失逸格。蓋其天姿如是，非後世之人力所可強致。此種天姿，自殷周一脈相承，秦漢以降漸漓，乃至東漢，將由天

機而歸於人意。开通褒斜道刻石，即此關鍵所在。惟尚多天機，有不可思議者。逮至乙瑛禮器諸碑出，人意醇粹，境界一新矣。石門頌刻於建和二年，晚於乙瑛禮器，然以地氣之故，猶存天機。雖然，亦偏於人意，不復能與开通刻石相比類也。（右开通褒斜道刻石。褒斜道開自永平六年，至永平九年通。此刻當在永平九年。世人多稱此碑刻於永平六年。古人當無刻石銘德於其事之未成之時之理。今人則吾不知也。）

漢袁安、袁敞二碑，純爲小篆，如出一手，而實有不同。吾友吳豈之謂其貌近似而神氣迥異。袁安有可疑者。其大體皆通婉暢潤，疏密精勻，漢人之清和溫柔，藉此以傳焉。然已失李斯之高格，且遜王莽時人之英氣，東漢篆體，將至於窮矣。二碑乃其徵兆也。（右漢袁安碑。永元四年立。袁敞碑，元初四年立。）

漢祀三公山碑篆體而隸意，吳天發神議亦其流亞也。觀其勢融液屈折，漸已定形，圓婉漸遒，方正豁成，格力駿發，活然欲出。學草書者，探本於分隸二篆。劉融齋言，張長史得之古鐘銘科斗篆。愚謂得之祀三公山諸碑，已能上乘。唐人北海行書入碑一路，實亦有祖述於祀三公山碑者。蓋北海以行寫楷，祀三公山以隸寫篆，皆多變勢，而合於天行，故甚相通也。（右祀三公山碑。元初四年立。）

後漢書儒林傳帝問劉昆曰，前在江陵，反風滅火，後守弘農，虎北渡河，行何德政而致是事。昆對曰，偶然耳。左右皆笑其質訥。帝歎曰，此乃長者之言也。吾觀冀州從事馮君碑，甚可想其長者風範。此碑非漢碑傑特，而自有此漢儒質訥之風。（右馮君碑。漢安元年立。）

景君碑篆額如紉蘭垂露，鐵線舞裾。碑則安泰裕明，若有睿聖，猶陳澧言鄭康成一輩漢儒已有程朱義理之湛明。其多存古篆之法，每每瀉露，出入其間，若爲康衢，頗有逢源之暢。而終以隸則爲歸，其遊藝恣行，復守於莊正之塗。此猶相如子雲之賦，馳騁而後，終歸於諷諫正義。（右景君碑。漢安二年立。）

石門頌爲今世人所盛推，至以爲漢碑冠冕。愚未以爲然。其

聲名之隆，非境界極高遠之故，乃今世禮教滅裂，人多喜放肆浪宕，旨趣往往與石門頌相合，而不安於漢碑之法度篤純者。石門頌爲隸書之仙，體勢瘦勁，絕有高華。褒斜道處中原、巴蜀交通之地，二地之文教風俗，共施潤澤。石門頌者，赫然有蜀地之風。蓋觀其氣質，溯之遠古，更與三星堆相近，而非鎬、洛之格度。其筆法則授於中國也。巴蜀爲仙家之淵藪。建和二年，張道陵生已百餘齡，鶴鳴山氣象已大。當彼之時，有飄逸雄放若石門頌出焉，亦曷足怪也。楊准表記摩崖爲石門胞弟，而蕩邁勝之，如軾之有轍，子瞻自謂不及其秀傑汪洋。而石門頌導流濬川，維邦經野，體勢疏廓，井然有致。時出宕逸，亦猶文王之嗜菖蒲，曾皙之癖羊棗，本爲人情常態。貴之蔑之太過者，皆非中道也。（右石門頌。建和二年刻。楊准表記。熹平二年刻。）

乙瑛碑體道風舒，骨豐肉和，如陳仲舉言爲士則，行爲世範，如黃叔度，其器深廣，汪汪難量。其和逸之美，必德行之所化。其暢達之姿，必雅量之所施。其風味清玄，時有灑落，亦同漢季郭林宗輩，已啟玄學清談之風。（右乙瑛碑。永興元年立。）

禮器碑爲漢隸瘦勁通神之典刑，兼有整秀、宕逸、雅潔、靈敏之美。其與曹全、史晨、孔宙、韓仁諸碑，風猷相類，而逸骨勝之。尊之者推爲第一，實爲私意。漢碑弘廓尊嚴，亦不必斤斤乎月旦之次第。然晉唐以來，尤擅秀逸遒勁之格，則不可不稱禮器澤化之深長。蓋母以子貴，禮器之見重於後世，亦有以此者。覃谿嘗言此碑於結構若有隨意伸縮，不能盡以繩度概之者，妙處亦正在此。唐世楷法至褚河南始啓不拘繩尺之漸，豈知漢隸早有先之者。山川融結，雲水流行，無非法也。何嘗有定法可稽。（見蘇齋筆記卷十四，引自今人劉仲華氏漢宋之間。）頗可與愚說相印證也。此特覃谿識力所在，言他人所未言也。（右禮器碑。永壽二年立。）

淮源廟碑亦立於桓帝隸書極盛之際，體雖扁平，神意極暢，筆法精密，勢度逼人，觀之如群星曜野，芒寒正色，不讓禮器、華山諸石。惟渾樸之意微少爾。（右淮源廟碑。延熹六年立。）